

#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立自主意蕴及其价值彰显

刘从德 吴宜临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独立自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与核心价值,其内涵意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方向道路自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一以贯之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从自身国情和历史条件出发,独立探索、开辟、推进和拓展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二是动力机制自立。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把实现现代化放在中国人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三是思想引领自主。以原创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四是战略蓝图自决。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自主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蓝图,实事求是地规划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凸显了独特的意义,破解了西方“定于一尊”的现代化逻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改变世界现代化版图、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层面彰显出重要价值。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独立自主;价值彰显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23)05-0051-11

DOI:10.14110/j.cnki.cn-37-1059/d.2023.05.017

现代化是社会形态由传统向现代、由落后向强大转型的必然选择,但现代化的实现模式并不定于一尊。世界现代化潮流浩浩荡荡,置身于其中的任何民族和国家不可能“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sup>①</sup>。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能够“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sup>②</sup>,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关键就在于坚持独立自主地推进自身现代化建设,把发展进步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 一、方向道路自觉:独立探索、开辟、推进和拓展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sup>③</sup>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立自主意蕴首先就体现在中国人民独立解决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要沿着什么方向、走什么样的道路、怎么走的根本问题。

独立自主地选择现代化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并不是说凭主观愿望来决定,而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选择。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夙愿,自洋务运动至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但都将希望寄托于“西学”“西化”,结果从器物、文化、制度等方面实施的“防卫性现代化措施”<sup>④</sup>无不以失败而告终。历史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这就产生了在中国实现政治独立后,另寻“非资本主义现代化”即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的历史必然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坚持独立自主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2ZD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从德,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地缘政治与大国战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吴宜临,女,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①②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7、63、68页。

④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1页。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中国迎来了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开启了以社会主义方式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进程。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课题。由于缺乏经验,加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党在建设之初曾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但不久便认识到苏联模式存在的弊端,认识到即使是苏联成功的经验也不全都适合中国。苏共二十大之后,党提出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独立自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客观规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任务。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明确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这一根本思想。1958年6月,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强调要独立自主搞建设,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sup>①</sup>

在此后的探索过程中,虽然历经曲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政治运动而基本停滞,但是党在这一时期提出的“走自己的路”的思想,为继续探索和开创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奠定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基调,提供了独立自主的方法论原则。同时,党在这一时期取得的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和宝贵经验。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sup>②</sup>,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sup>③</sup>。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sup>④</sup>。同时,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国情,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装备,用以作为现代化发展的起点<sup>⑤</sup>。因而,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唯一出路。1978年12月,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历史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sup>⑥</sup>,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建设现代化的伟大探索。

经过三年多的“拨乱反正”和局部改革,国家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开始逐步摆脱困境,迈入健康发展轨道,人民群众因此取得了对改革开放的共识,增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为抓住时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了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鲜明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sup>⑦</sup>的重大命题,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行动纲领。此后,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各方面改革陆续展开和推进,对外开放的地域和领域不断扩大,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经过持续推进,中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压舱石”的历史性突破,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实践充分证明,党领导人民在独立自主进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成功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sup>⑧</sup>,正确解决了后发国家如何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搞建设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同时,世纪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世界现代化面临世界性与民族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②③⑤⑧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162、133、163页。

④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间的矛盾与冲突”<sup>①</sup>。从国内环境来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也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上。面对新境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定道路自信,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走上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并作出了许多新发展,集中体现在: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主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着力解决卡点瓶颈,蹄疾步稳推进改革,着力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方位改善人民生活,集中力量实施脱贫攻坚战;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坚决维护国家和社会大局稳定,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经过十八大以来十年的艰辛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进程中,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 二、动力机制自立:把实现现代化置于中国人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任何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一定的动力机制下发展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现代化,既没有依赖外部力量的“捷径”可走,也没有教科书和现成答案,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自身实践。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独立自主性的最直接体现。

第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中实现现代化,不能通过内在现代性因素的长期自然演进形成,而是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sup>②</sup>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承担起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任务,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开启并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呈现:一是创建和发展现代制度。制度因素是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近代以来制度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制度基础。并且,我国在长期探索实践和改革创新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现代化的推进与拓展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篇,明确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世界现代化运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和方法路径的关系,从而为中国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构筑了坚实理论根基。三是制定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决策。发展战略是决定现代化能否实现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立足不同历史阶段,在全面审视和准确把握战略环境、战略机遇、战略需求的基础上,从建设领域、步骤、时间、空间等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擘画蓝图、谋篇布局,从而实现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升级和阶段推进。四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内核。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价值观的支撑与引导。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整体意志、社会集体诉求、个人独特意愿三个层面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从而对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发挥了凝心聚魂、引领方向、规范行为的重要作用。

第二,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性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主体,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力

<sup>①</sup> 钟慧容、刘同舫《中国共产党现代化事业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sup>②</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量。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内在规定了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使其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主体性动力。在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面对由于国家内部经济基础薄弱和外部遭遇帝国主义经济封锁而带来的建设资金严重短缺问题,广大人民群众以投身国营经济增产和踊跃认购国家建设公债等方式,创造了主要依靠内部积累来支撑工业化建设的新路径。改革开放以后,在推动经济现代化上,人民群众在创新生产管理方式、促进发展模式转变、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质量以及实现科技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攀升、国家经济实力持续增强,最终推动中国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根本性转变;在推动文化现代化上,人民群众不仅运用自身创新创造活力,生产了大量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并且还在与世界各国人民“草根”对“草根”的直接交往中促进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朝着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不断迈进;在推动治理现代化上,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作为,推进了国家治理理念、模式、手段和方法的不断创新,推进了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从而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了社会根基;在推动生态文明现代化上,人民群众在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上的自觉性、主动性不断增强,参与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的模式也逐渐趋于多元化,使美丽中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总之,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广泛参与和积极作为,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效率和质量的提升。

第三,以党和人民协同推动构建强大合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力量,但这两种力量并不是“各行其是”,而是紧密结合,在双向互动中形成“协同性推动力”<sup>①</sup>。改革开放之初,迫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安徽、四川、云南、广东等多地基层干部和群众勇敢冲破体制束缚,自发采取了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以产定工、超额奖励”“五定一奖”<sup>②</sup>等多种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使得农业生产明显提高。基于此,中共中央不久便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这些责任制的实行作出了回应和肯定,从而极大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步伐。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诸多难题和困境,一些地方的基层党组织亦同人民一道,将法治、德治和自治三者融合统一,为实现基层治理的善治开创了新路径。“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sup>③</sup>中国共产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在制定各类政策中充分尊重群众意见,进而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的热情、智慧与力量。与此同时,正是由于人民群众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按照党绘制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有序推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任务,使其主体性力量在实践中得到有效发挥。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由下而上集中群众智慧,同时由上而下形成决策指导的双向互动过程”<sup>④</sup>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第四,以外部资源为必要辅助。“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sup>⑤</sup>中国式现代化在依靠自身力量谋发展的同时,也注重对外部资源的利用。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和工业现代化,离不开“全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sup>⑥</sup>,因而逐步确立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sup>⑦</sup>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sup>⑧</sup>的基本方针,要求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和利用外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一切真正好的东西,把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

① 胡洪彬《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生发逻辑、内在机理与成功密码》,《学术界》2021年第10期。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673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论党的群众工作——重要论述摘编》,北京:学习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④ 马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⑥⑦⑧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0、380页。

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sup>①</sup>。同时,也明确要求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随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新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准确判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础上,拓宽了利用外部资源的思路,确立了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大力加强引资、引技、引智,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开放型经济,改变了国内长期存在的短缺局面,使得中国经济实力借经济全球化之机遇得到快速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并从“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sup>②</sup>上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充分发挥内需潜力,“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sup>③</sup>,推动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 三、思想引领自主:以原创性的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思想上的独立自主,就没有行动上的独立自主。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既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创造和发展中国自身独特的现代化理论,同时也坚持主动与影响或阻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在正确思想理论指引下前行,赢得了历史主动。

首先,在守正创新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创造。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立党立国、兴党强国之“根本”,并在坚持解放思想 and 实事求是相统一、与时俱进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篇”。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独立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问题,形成了许多独创性的理论和原则,如社会主义社会包括不发达和发达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依然有矛盾,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要重工业,又要人民”<sup>④</sup>,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协调发展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sup>⑤</sup>;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作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正是在这些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创造了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苏联的工业化新模式,并通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sup>⑥</sup>,必须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进而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成果,包括时代主题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两个文明共同建设论,等等。这些重大理论创新深刻揭示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根本任务、发展动力、方法路径等,为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中,党中央领导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6页。

②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827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④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7页。

⑤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全党全国人民不断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理论创新,创造性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正是基于党在理论创造上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中国才逐步建构起符合自身国情、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风险考验。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条件和发展环境、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价值取向和原则要求、发展理念和战略安排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阐发,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课题,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新飞跃。也正是基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才能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实现从“赶超”到“引领”的历史性转变,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强起来”的新阶段。

其次,与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类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自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伊始,中国共产党便高度重视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坚持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的原则,在重视加强理论创造、理论武装的同时,注重与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错误思潮作不懈斗争。

新中国成立之初,适应社会制度变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内尚存的一切反动派的思想残余进行了彻底清算,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此后,在工业化实践进程中,为了使人民群众团结一心投身于工业化建设,党不断纠正了社会上一些对党的理论与政策的误读和质疑。譬如,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中共中央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相应发展农业、轻工业的思想。然而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这些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农业税,这势必会增加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负担,由此,社会上便产生了一种要求政府“施仁政”的观点。对此,毛泽东同志进行了有力批判,他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当前利益的小仁政,另一种是为人民长远利益的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重点是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照顾,但是不可多改善、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sup>①</sup>。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施仁政”观点的错误之处,对消除当时一些干部群众思想上的困惑、凝聚起团结发展重工业的强大精神力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扭转“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意识形态领域严重混乱状况,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开展了全面的拨乱反正运动,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股攻讦社会主义、鼓吹西方民主和自由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国内产生。对此,中国共产党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捍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入21世纪后,党充分吸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保持高度警醒,批驳了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其他带有政治指向性、现实关联性的谬论,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更加激烈。同时,由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力量对比

<sup>①</sup>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164页。

持续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愈发感到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加紧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大肆制造和宣扬各种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论调和话语工具。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斗争精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把维护和巩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作为事关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全局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在全面把握国际国内新形势、意识形态领域新态势、信息化发展新趋势的基础上,统筹国际国内、线上线下等不同场域,同一切妨害政治稳定和现代化发展的思想谬误进行了伟大斗争,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廓清了思想迷雾。

#### 四、战略谋划自决:实事求是地自主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蓝图

现代化是一个多面向、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sup>①</sup>。中国共产党坚持在遵循世界现代化运动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的实际国情、特殊历史文化条件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独立自主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谋划。

一是在“工业化”战略基础上逐步提出“四个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夕,随着建设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安排部署逐步走向系统化、成熟化,实现了由单一“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转变。

工业化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是强国的必由之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获得了工业化建设的基本政治条件。新中国成立三年后,在人民政权得到巩固的条件下,工农业生产的新发展,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特别是国营工业的比重逐渐占据优势地位,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迅速壮大,使得建设国家工业化获得基本的经济条件<sup>②</sup>。同时,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新的战争危险不会在短时期内出现,加上苏联的友好互助合作与经济援助,为中国开展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sup>③</sup>。鉴于内外两方面的条件都已基本具备,党适时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1953年12月,经毛泽东同志修改审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被最终确定为党在过渡时期的主体任务,并写入党的正式文件<sup>④</sup>。

1954年9月,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即“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sup>⑤</sup>。1957年8月,周恩来提出工业现代化“包括交通运输在内”,因而“交通运输现代化”不再被单独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概念<sup>⑥</sup>。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相并行,党不久就把视野拓展到发展科学技术上面。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差,科学研究事业仍处于初创阶段,科技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不能满足国家工业、农业、国防和军队等各方面建设的要求。基于对发展科学技术紧迫性和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在1956年1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提出,要在几十年内改变国家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要求<sup>⑦</sup>。此后,毛泽东又在1957年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和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对中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页。

②③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页。

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4页。

⑥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75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国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作出新表述,即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sup>①</sup>。这就将“现代科学文化”纳入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构想之中。1959年12月,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提出要把国防现代化加入到国家现代化的内容之中<sup>②</sup>。1960年2月,周恩来在关于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发言中,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sup>③</sup>。这样,“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基本内容就被完整提了出来。

进入20世纪60年代,党中央开始从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来构想中国的现代化图景。1964年底,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社会呈现欣欣向荣状态之际,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向全国人民正式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并且为建设实践的顺利推进,指明了“两步走”的发展步骤和路线图,即在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sup>④</sup>。

二是提出“小康式现代化”<sup>⑤</sup>目标。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党中央从实际出发,以“小康”重置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并根据形势发展要求,调整和细化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形成了由低水平小康到高水平小康、由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渐进发展过程。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sup>⑥</sup>的全新命题。这一提法,旨在以“中国式”来明确中国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从中国的特点出发”<sup>⑦</sup>、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同年12月,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同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sup>⑧</sup>的战略构想。在这里,将“中国式”具象化为“小康”,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适宜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指标和评判标准。而20世纪末的“小康”是什么样的?邓小平同志也曾给出回答,就是“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日子普遍过好”<sup>⑨</sup>。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的战略目标。作为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小康”的提出,符合经济落后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从战略安排上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问题,反映了党对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约十年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都大体上翻了一番”,党中央认为如期到20世纪末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完全有把握的。因此,党的十三大确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sup>⑩</sup>的更高目标。此后,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战略指南稳步推进,到20世纪末,“三步走”中的前两步目标已基本实现。为了在新世纪走好“第三步”,顺利实现既定目标,党的十五大顺势而上,对“第三步”进行了阶段细化,提出“新三步走”战略。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协调性不足、发展不充分、发展方式亟待转变等问题日益凸显,倒逼国家现代化战略作出适时调整。为此,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大先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新目标,从而实现了“小康”的内涵拓展、战略升级和阶段推进,初步形成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②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0页。

③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75页。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

⑤ 唐爱军,《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哲学研究》2021年第9期。

⑥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4页。

⑧⑨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161—162页。

⑩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了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六大领域的现代化布局。

三是擘画“全面的现代化”蓝图。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适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在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基础上,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全新部署。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紧紧抓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将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小康建设任务推向高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sup>①</sup>,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现代化发展的思想藩篱和体制机制弊端。2013 年 11 月,党中央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专题研究,首次从治理层面提出现代化要求,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sup>②</sup>,而切实贯彻和推进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必须加强法治保障和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为此,党中央又相继提出实施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举措,逐步确立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党在新形势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总抓手。

顺应中国经济社会新发展,立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党的十九大作出通过“两个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 21 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sup>③</sup>。“两个阶段”压缩了“三步走”和“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对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长规划,同时从现代化建设领域和建设水平两个维度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体系,是党立足新的历史条件和发展实际,坚持独立自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的战略安排。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大台阶,但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在即将如期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之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按照“两个阶段”战略安排,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 2035 年远景目标作出了更加详尽的部署。至此,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全面系统,就内容而言,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和军队六个领域的现代化;就类别而言,涉及“人”的现代化、“发展”的现代化和“治理”的现代化。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正式宣告中国式现代化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并对各领域现代化目标作出了进一步阐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了行动指南。

## 五、价值彰显:破解多重旧逻辑,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

首先,破解了中国历史上以“西学”“西化”和“中国本位”谋求国家现代化的旧逻辑。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中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紧闭的门户之日起,中国人便开启了为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而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征程。在传统失序、国家逐步沦为“双半”社会的境遇下,为应付外来资本主义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将目光聚焦于西方文明的创新,但晚清时期在“西学”逻辑下进行的无论是器物技术层面变革还是经济政治制度层面变革,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五四运动以后,面对民族危机和因世界经济危机导致的国民经济衰落,中国对西方文明有了新的估价,现代化探索又从制度层次上升至精神层次,将中国现代化出路问题归结于文化,产生了以“西化”和“中国本位”实现现代化的两种对立方案。但实际上,这两者僵硬的文化观和内涵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都注定了它们的非科学性。总的来看,

<sup>①②</sup>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3、512 页。

<sup>③</sup>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年版,第 20 页。

早期中国现代化探索始终在惟洋是崇与盲目排外、抄袭外国与回归传统之间摇摆,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能找到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正确出路。

历史经验证明,“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sup>①</sup>。能否正确认识传统与现代性这对矛盾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正负两方面效应,是一个对后发国家现代化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问题。早在1943年,毛泽东就提出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sup>②</sup>相结合的要求。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关于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新文明与中国实际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作出的独创性思考。秉持这一思想,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坚持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中国特色”与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相结合,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将“中国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与“现代化道路”的发展逻辑创造性融合的现代化新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其次,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振兴前行带来新希望,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新的生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壮大,是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竞争和较量中前行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如何在“单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便成为崭新课题。对此,列宁在国内战争结束后进行了艰辛探索和深入思考,在深刻总结和反思新经济政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晚年遗嘱”中发展了其以前论著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思想,认为以“先革命、后建设”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在创造完全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前提条件和基础的时期内,要以改革的办法解决国家建设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并且提出了以发展合作制为中心的经济改革构想、以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为主旨的政治改革构想、以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文明为目标的文化革命构想,以期走出一条适合苏维埃俄国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惜,列宁未能完成自己的探索就溘然长逝了。

在少数甚至单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也是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波谷低潮、苏东剧变阴霾,重新振兴前行的唯一途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sup>③</sup>,开启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新征程。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不仅要面对与先发型国家之间经济、技术差距愈来愈大的现实,更要面对国际因素的干扰与限制,而这往往导致现代化进程的错位。面对各种外来的、与日俱增的他变量的影响与干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苏联为鉴戒,始终坚持在方向道路、动力机制、思想引领、战略布局等方面的自觉自为,形成了自己的经验与特色,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并以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洪流中实现了从“赶超”到“引领”的角色转变。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使欣欣向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再次,破解了现代化道路“定于一尊”的固有逻辑,深刻改变了世界现代化版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走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选择。现代化进程虽然是世界性的,但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由于各自所处时代环境、基本国情、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发展道路选择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特征。就西欧、北美现代化模式而言,其主要特征在于以资本为主导,通过对内剥削压榨和对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0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页。

外殖民扩张等方式完成现代化发展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实现资本的无限扩张和增殖。就苏联模式而言,其主要特征在于经济上实行单一公有制、农业集体化、完全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重重工轻轻工”的政策导向。就拉美现代化模式而言,其主要特征在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拉美地区的国家自实现国家独立后,便开启了工业化进程,但由于在思想上迷信西方贸易优势互补论,曾一度凭借自身较强的自然禀赋,向西方市场大量出口矿产资源、农产品以及初级工业品,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推进了现代化进程。但这同时也造成了经济发展对西方国家的过度依赖,从而丧失了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权,长期陷入受制于人的发展困境。可以说,在世界现代化近300年的历史进程中,居于先行列的西方现代化,其理论和模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引致了世界现代化长期“定于一尊”的发展格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尊重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出发,坚持独立自主探索、推进和拓展现代化建设,创立了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打破了只有以资本主义方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妄言;秉承中华民族崇尚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传统文化基因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属性,坚决摒弃了以损人利己、血腥暴力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创造了依靠内部积累,以和平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化的新路,打破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摆脱了“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束缚,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极大丰富了世界现代化图景,为后发型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模式,对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了中国方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有什么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就有什么样的现代文明形态,因而现代文明具有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两种不同形态。但总的来看,“在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出现之前,‘对抗’和‘分裂’一直存在于整个文明期”,资本主义文明则是作为对抗性的文明形态的最高形式<sup>①</sup>,其对抗性集中体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而这也是人类文明继续向前发展所必须破解但又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难题。

实现“两个和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理想,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应然面向。因应这一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的同时,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统筹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倡导和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坚持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为世界谋发展,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立自主实践以“以人民为中心”超越资本至上、以共同富裕超越两极分化、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超越人的不断异化、以生命共同体超越人与自然二元对立、以和平发展超越霸权主义的发展逻辑,实现了对以往各种文明形态的辩证否定和积极扬弃,创造了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大文明”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

[责任编辑:邓 帅]

<sup>①</sup> 孙熙国、陈绍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世界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